

精神分析 和新弗洛伊德主义

[苏] B·M·雷宾 著

李今山 吴健飞 译

常富英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精神分析和 新弗洛伊德主义

〔苏〕 B. M. 雷宾 著

李今山、吴健飞 译

常富英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88年

В.М.ЛЕЙБИН
ПСИХОАНАЛИЗ
И ФИЛОСОФИЯ
НЕОФРЕЙДИЗМ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7

根据苏联政治文献出版社1977年版译出

精神分析和新弗洛伊德主义

〔苏〕В. М. 雷 宾 著

李今山 吴健飞 译 常富英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通县振兴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6.6 印张 160 千字

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ISBN 7-80050-041-1/B·14 定价：1.95元

提 要

新弗洛伊德主义是以奥地利神经症医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思想指导的现代西方最流行的学派。怎样来解释西方对新弗洛伊德主义的特殊兴趣呢？在哲学科学副博士B·M·雷宾 这本著作中透辟地研究了精神分析思想的发展历史，批判地考察了古典精神分析和它的各种变种，其中包括新弗洛伊德主义的概念。

本书对象是教学人员和大学生，同时它也必将会引起对哲学和心理学感兴趣的读者的注意。

绪 论

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领域中，可以划分出许多所谓人类学派的学派，其中每一个流派都是按照自己的方法去研究那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如对人自身的研究，人在各种社会法规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人与文化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关系，人生的意义，人生在世的使命等，即考察人自身存在的问题。新弗洛伊德主义或许也应算作这些学派中的一个，它以形形色色的变体和变型再现了奥地利医生、神经病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基本思想，并且近几十年来，在许多方面对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状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新弗洛伊德主义是一种独特的哲学世界观，它是以弗洛伊德当时提出的，构成精神分析学说实质的一定原则和立场为基础的。新弗洛伊德哲学，是精神分析理论合乎逻辑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地取得了世界观的地位。总之，正是由于和资产阶级世界广泛传播的全部弗洛伊德主义及精神分析的有机统一和遗传学方面的血缘联系，所以，才使新弗洛伊德主义在20世纪后半期，得以成为西方的基本哲学派别之一。

但是，在资产阶级的文献中，对于精神分析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精神分析这一术语本身在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已成为适用于各种场合的陈词烂调。因此，这一术语在使用上常含有双重，甚至多重含义。由于它的含义很不确定，以致有时甚至很难把握它在一些作者那里究竟具有什么内涵^①。加里福尼亚大学精

^① 在阐述精神分析在现代精神病学中的地位的波士顿学术讨论会（1968年5月）上，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现代精神病学中的精神分析》，M·高尔斯顿编，1969年，纽约，英文版，第55页）。

神病学教授马尔莫勒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研究的技术，是一种治疗理论和技术^①。另一些作者认为，精神分析是人类行为的一般心理学，一种研究和探索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疗方法^②。按照哲学家凡恩的观点看来，应把精神分析看作是：一，侧重于人的无意识力量和动态力量的心理学体系；二，是一种治疗的方法；三、是对人生和幸福的一种哲学观点；四，是以使用精神分析思想为基础的各种学派^③。新托马斯主义哲学家R·马利坦还把作为心理学研究方法和精神病治疗方法的精神分析同作为哲学的弗洛伊德主义区分开来。他认为，精神分析方法、弗洛伊德主义心理学同弗洛伊德哲学之间，或许存在更为具体的差别^④。

实际上，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主义是什么呢？如果对这一问题不做出一个只有一种含义的回答，就未必能对新弗洛伊德哲学作出卓有成效的剖析。

自精神分析作为用自我净化法(另译精神宣泄法——译者注)治疗神经症的一种独特方法，在精神病学领域中产生以来，它最初曾是一门纯医学学科，它并不企望去起关于人的普遍心理学说的作用，更不企望除人的心理功能机制外，还去起那种揭示和说明文化、社会 and 文明的发展规律的哲学学说的作用。但是，随着精神分析的发展和普及，它不仅得到医学界的承认，而且得到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法学家、文艺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承认，精神分析的理论观点、原理和原则作为解释个体一个性、文化和社会现象的方法，已被应用于人文科学各个领域之中。

① M·高尔斯顿编的《现代精神病学中的精神分析》，第7页。

② 《精神分析和社会工作》，M·海曼编，纽约，1966年英文版，第169页。

③ R·凡恩；《弗洛伊德的思想发展：从开始(1886——1900)到本我心理学(1900——1914)，到自我心理学(1914——1939)》，1937年，纽约，英文版，第X页。

④ 《弗洛伊德和20世纪》，B·纳尔逊编，克利夫兰—纽约，1963年，英文版第231页。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力图在自己的著作中跟所有的哲学都划清界限。他宣称精神分析学说不能算是一种完备的哲学体系。但是，他的这一意图并没有能够贯彻到底，而且有时他还发表一些与此相矛盾的论述，时而认为他自己的思想接近于恩培多克勒、柏拉图和叔本华的哲学，时而强调精神分析观念的独立性和独创性，时而断言精神分析是处于医学和哲学之间的中间地位。尽管弗洛伊德曾断言，他的理论思想的形成没有受任何一种哲学的影响，然而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却常常把他这种论断看作是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主义的自然科学前提占优先地位的证明^①。应当说这一看法是片面的。根据一些曾同弗洛伊德共过事的目击者回忆和一些研究精神分析奠基人的生平、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人们的结论证明，哲学家们的思想对他产生过影响。大家知道，特别是弗洛伊德在大学时代曾研究过苏格拉底、索福克勒斯，翻译过詹姆士·穆勒的一部阐述柏拉图哲学思想的著作，并且十分熟悉柏拉图的如《曼诺》等这样一些著作，听过有关讲授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专题课，对帕斯卡、康德和黑格尔的一些哲学思想也有所了解^②。弗洛伊德的所谓“摈弃”哲学，可以作如下的解释：他希望摈弃当时流行的关于人性的哲学唯心主义思辨，而强调自己的理论是以临床观察的事实为基础的科学性质^③。显然，那种认为

① 例如约翰·布劳恩断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观点，与其说以哲学家们的抽象思维为基础，不如说以病理学家、心理学家、生理学家的具体材料作为根据。他认为，这一点已为弗洛伊德对一般哲学持否定态度的事实所说明（约翰·布劳恩：《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的门徒》，巴尔第摩，1961年，英文版，第6、179页）。

② S·贝恩德：《弗洛伊德的科学开端》，载《美国无意识意向》杂志，1949年，英文版，第6卷第3期第188页；E·贡涅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平和著作》，第1卷，1959年，纽约，英文版，第37、59页；R·沃尔海姆：《弗洛伊德》，1971年，伦敦，英文版，第55页；G·列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75年，波士顿，英文版，第32页—33页，《心理学上的人》，R·博伊斯编，1975年，纽约，英文版，第40页；S·卡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论文集》，1976年，纽约，英文版，第62页。

③ J·里克拉克：《个性理论的哲学科学》，1968年，波士顿，英文版，第330页。

精神分析理论的形成，既决定于自然科学，又决定于哲学观念的看法，更为正确①。

数百年前，帕斯卡曾说过一句颇为机智的话：“轻视哲学——就意味着真正在议论哲学。”如果把这一句格言运用于弗洛伊德这里，那么他这种摆脱哲学的企图，正是一种研讨哲学的方式，这跟现代的口头上呼吁非意识形态化，而实际上却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如出一辙。这种具有哲学论断和哲学概括的倾向，不仅在精神分析奠基人那里看得很清楚，而且这一种倾向已成为精神分析理论观点的隐蔽的本质，这决不是偶然的。正象以往的许多思想家那样，弗洛伊德并没有局限于某一个研究领域，而是离开医学去研究个体一个性和社会生活的许多现象，最后创立一个完整的观点体系，而且同以往许多著名的哲学体系比较起来，似乎也毫不逊色。弗洛伊德以系统的方式表明了他自己对历史哲学、精神现象学、宗教、文化和艺术的起源的理解。用C、茨维格的话来说，弗洛伊德在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哲学概括里以医学为出发点的程度，并不比帕斯卡以数学、尼采以古典哲学为出发点的程度大。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思想走过崎岖的改革之路，“已经从一种素朴的临床假说，变成一种世界观的理论，从而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鲜明的代表和工具。”②因此，如果严格地说来，精神分析被看作是一种研究和治疗神经症的方法的话，那么，弗洛伊德主义就有一定的观点体系、世界观的一种特殊形态、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一个时髦的流派。

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力求揭示、领会和概括的不仅是个性内部

① 参见B·M·莫洛佐夫：《国外精神病理学的现代派别及其思想渊源》，1961年，莫斯科，俄文版；K·И·索波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哲学原则》，1969年，高尔基市，俄文版；X·德米特洛夫：《精神分析和哲学·精神分析的来源和演进评述》，1973年，索菲亚，保加利亚文版。

② Ф·巴辛、B·罗日诺夫、M·罗日诺娃：《弗洛伊德主义：心理现象的伪科学学说》，《共产党人》杂志，1972年，第2期，第94页。

心理机能的事实，而且还包括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等诸方面，所以，精神分析在他们那里就具有更为明显的哲学世界观的性质。而且，他们在自己的假设中不象弗洛伊德固有的那样只简单地依据恩培多克勒、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列邦、尼采、叔本华和柏格森的某些思想。在新弗洛伊德主义者的著作中，自始至终贯串着哲学问题，他们在这些著作中经常援引德尔图良、奥古斯丁、阿伯拉尔、康德、黑格尔、郭尔凯戈尔、杜威和詹姆士以及佛教、道教神秘主义者的话。围绕这些哲学问题，构成对与临床材料研究有关系的具体问题的讨论和理解。

新弗洛伊德学派在精神分析运动中的建立和形成，首先是与重新考察精神分析奠基人所确定的那些思想有联系，这些思想暴露出它在理论上的局限性和在实践中没有发展前途。许多古典精神分析原理，由于缺乏根据和不能得到证实，不仅受到人们的怀疑，也遭到一些力求建立自己一套观点的新弗洛伊德主义代表人物的批评。

但是，这一类批评通常是涉及弗洛伊德学说的具体方面（如：神经症个体的精神分析检查程序和治疗神经症的特点；对制约冲突情境的产生和个性意识分裂的各种内部心理过程的解释，对心理结构层次和无意识作用机制的理解），或是，反对把根据个别现象的研究所提出的假说扩大为个性和社会发展的较为一般的规律性。另外，象古典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概念图式和理论观点，包括“无意识心理学”、人活动的非理性因素的观念，个性内部世界的冲突性和分裂性、文化和社会的“压抑”，亘古以来似乎就成为每一个个体固有的恐惧和不安感，以及研究个体个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精神分析方法本身——所有这一切，在新弗洛伊德主义者的观念中都还保留着自己的重要意义，并且证明，它们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内在的血缘关系。

古典精神分析奠基人的个别理论原理，不仅有机地渗入到新

弗洛伊德主义者以及与他们在世界观上相近的作者（他们探讨在现代文明的条件下人的实质和存在问题）的观点中去，而且通过相应的观点和观念的中介折射之后，而成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人格主义这些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武器，并且也成为许多具体科学，其中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刑法学和文艺学等等学科代表人物的方法论。

存在主义哲学的拥护者把研究人的活动的精神分析方法同随后对这一活动的意义和隐蔽内容的揭示分开来。有些资产阶级理论家甚至认为，弗洛伊德本人就可以直接被认为是存在主义者，因为，弗洛伊德在自己的著作中不仅提出存在主义的命题，而且还以纯粹的存在主义的精神来探讨这一类问题。譬如，波·契里赫认为，“从以存在主义观点来描述处于危急情境的人这一点来说，弗洛伊德是一个真正的存在主义者。”^① 尽管把弗洛伊德说成是一个存在主义者未必那么公正，但是，他的某些思想确实被当代的存在主义者所接受和发展，例如，萨特在考察本体论的存在和社会的存在时，就曾经求助于古典精神分析的方法论^②。当然，这不是说萨特完全把弗洛伊德的思想“移植”到他自己关于人的意识和心理的现象学概念的框架中了。萨特是用他的批判的手术刀将弗洛伊德的生物遗传的破坏性本能、“里比多”的象征意义以及人的物质自然观等等给切除了。但是，弗洛伊德对人的活动的分析和阐明具体情境中的个体行为的意义和动机的方法，不仅被这位法国存在主义者吹嘘为弗洛伊德对认识和说明个体个性结构与本体论结构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贡献，而且用这一方法来揭示人的存在的意义、人生的悲剧性和喜剧性、个性的“设

① 《精神分析和存在论哲学·存在主义对现代精神分析的重要影响分析论文集》，H·鲁登贝格编，1962年，纽约，英文版，第11页。

② 参见：Л·И·菲里波夫的《萨特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构想和结果》，载苏联《哲学问题》，1968年，第7期；Т·А·库兹明娜的《弗洛伊德和萨特的人的存在和个性》，载《现代哲学中人的问题》一书，1969年，莫斯科，俄文版。

计”、“计划”、意向以及它们在“现存在”的条件下的不完备性和不可及性。萨特把自己对人的活动的现象学分析方法就叫做“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而且承认他所研究的观念同古典精神分析方法论观点之间，具有一致性和继承性，这决不是偶然的。

精神分析思想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并不是单方面的。我们可以指出，存在主义思想已渗透到各种精神分析学派，同时存在主义理论家也使精神分析观点有所发展和深化。因此，正如A·E·谢洛基雅正确指出的那样，“在现代资产阶级的，特别是西欧、美国的哲学、艺术和文学体系中，精神分析学家和存在主义者这两个相应的学说，不仅是互为条件，而且也是互为补充的。”^①

精神分析思想，在西方，特别是在法国的结构主义运动中，也得到反映^②。很清楚，在K·列维-斯特洛斯的、R·拉康、M·富科这些结构主义者的观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语言学问题和精神分析问题趋于结合的倾向。结构主义者批判了弗洛伊德在解释个性的深层^③时的生物主义和机械论，但他们却认为，正由于古典精神分析对人的活动的无意识机制和语言的符号职能的强调，不仅为客观地认识人的心理的个体发育的发展和系统发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而且也为客观地认识语言结构、社会关系、个体在社会中生命活动的社会调节机制开辟了新的前景。结构主义是使用精神分析研究方法，来揭示思维和语言的结构化过程，以及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民族学、历史和经济等方面的因素结构化过程的。例如，K·列维-斯特洛斯的就试图根据古典精神分析思想去揭示支配原始社会的社会意识结构的无意识机制；又如

① A.E.谢洛基雅：《论意识和无意识心理问题。一般理论的阐释和叙述初探》，第比利斯，1973年，俄文版，第118页。

② 《法国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结构研究》，J.迈西曼编，1972年，纽黑文，英文版。

③ 参见H·C·阿美特诺茨的《R·拉康的精神分析观点》，载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73年第11期。

M·富科在研究理性构成之外的人的表象的基本结构时，力求说明科学思维的内部规律性，以便建立“人文科学的考古学”；又如R·拉康在研究个性时，把注意力放在无意识在人的生活中的作用方面，并且对概括地用“象征性的”、“想象的”和“现实的”这几个范围表示的内在心理结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60~70年代，法国青年一代结构主义者紧步K·列维-斯特洛斯的和R·拉康这些理论家的后尘，开始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思想积极地应用于文艺学，并把它们同艺术作品文句的语言学分析，同对作品内容的神话式的解释结合起来^①。由此可见，精神分析的观点已广泛地运用于结构主义者的理论著作中，他们试图把分析个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语言学观点和精神分析观点结合在一起。

在资产阶级人格主义哲学中，曾发生与精神分析思想同化有联系的特殊变态。其内在实质为宗教神秘主义的人格主义哲学，仿佛应当是弗洛伊德主义的直接对应体，所以，许多人格主义者坚决扬弃了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观念，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是，在这两个资产阶级哲学派别之间，除了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歧之外，不仅存在共同点，而且也还有作为分析个性、社会和文化的基础的，普遍适用的方法论观点，跟弗洛伊德主义一样，人格主义也试图对“人的本性”、个性的存在作出新的解释，为现代文明和人的存在之间无法解决的冲突设定论题。同时，包括I·穆尼耶、L·李凯尔、R·佛留耶林、E·布莱特曼等在内的人格主义代表人物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个性的精神世界、内部心理冲突和个性的创造的主观性上。但是，在阿德勒和荣格这样一些弗洛伊德主义者的著作中，对这一类问题的研究也是相当认真的。不是别人，正是阿德勒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提出个性的主观能动性问题的。荣格则是最早讲“人格面具”是个性的特殊的精神级的学者之一。一言以蔽

^① J. 斯帕克特，见《弗洛伊德的美学。对精神分析和艺术的研究》，纽约—华盛顿，1972年，英文版，第186、198页。

之，研究人的存在的人格主义的这一断面，在弗洛伊德主义者的著作中是有的，而它不可能不影响现代人格主义者在其著作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有些西方研究者确信，精神分析思想不仅对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人格主义这一类个别哲学流派产生过显著的影响，而且，实际上，对所有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学派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①。

精神分析对资产阶级社会学也有十分明显的影响。许多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在研究社会组织结构、政治运动、个性的反社会行为动机时，都运用改头换面的精神分析方法的变种、弗洛伊德的观念图式以及“理想化”、“升华”、“投影”和“认同”等精神分析概念。有的个别理论家甚至断言，古典精神分析内在具有的所谓“社会实体”，必须从精神分析观念体系中截断，以便它能够进一步地独立发展。例如，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就其真正实体而言是“社会学的”，而“精神分析的奠基人的‘生物主义’无非是具有深度的社会理论”^②。

归根结底，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中，为了研究个性和社会，精神分析方法应用得十分广泛，以致弗洛伊德对于各种生活现象的解释，变成一种固定的模式，人们试图用这一模式径直地去解释一切，从“性革命”一直到那些反对种族歧视、反对在亚洲和非洲大陆发动战争、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垄断政策的各种社会运动。例如，60年代西欧各国和美国的“新左翼”运动和大学生造反事件的产生，被一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说成是存在于尖锐的“两代人的冲突”，是青年反对父辈权威下意识冲动的高度心理反应。弗洛伊德的“奥狄普斯情结（它象征着父子之间对他们的爱的对象——母亲——所表现出来的不可调合的，以及自古以来就存在的

① 《精神分析和哲学》，Ch·汉利和M·拉兹劳维茨编，纽约，1970年，英文版，第1页。

② H·马尔库塞：《恶与文明·对弗洛伊德的一个哲学质疑》，纽约，1962年，英文版，第5页。

竞争)，被看作是青少年对当代不满情绪和反叛行为的基础和主要原因，青少年们无论是同他们的父母，还是同整个成年一代，都没有共同的语言①。

弗洛伊德的动机在L·福乌尔、P·古德曼、H·辛克莱、B·别列尔松和L·李比尔特这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的研究著作中都有明显的反应。最近一个时期，有些社会学家愈来愈坚持把精神分析理论和社会学理论合成一体的思想，因而号召去发展“精神分析社会学”这样一门学科。

在西方，精神分析思想也被运用于历史学、民族学、法学、文艺学、艺术理论以及其他一些学科，这些学科的一些代表人物也从事于弗洛伊德主义的研究，因而在各门学科的接合点产生了精神分析研究的一些新的领域，出现了一些精神分析学派和一些试图创造性地发展弗洛伊德观念的学派。

特别是在资产阶级历史科学中，有人宣称，所谓“历史精神分析”，是作为一门特殊学科而独立存在的，这一门学科对历史事件、对国家领导人和政治领导人的活动的分析，都被认为对历史材料的精神分析的阅读和理解有直接的联系②。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正是弗洛伊德和W·布里特一起首先试图把自己关于无意识心理活动的研究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现象，特别是应用于分析美国第二十八届总统威尔逊的生平和政治活动上，那么，“历史精神分析”同弗洛伊德思想的联系就十分清楚了③。尽管弗洛伊德和布里特预先声明，他们这一著作不能称为对威尔逊的精神分

① L·福乌尔：《两代人的冲突·大学生运动的性质和意义》，纽约，1969年，英文版。下面的著作也是用精神分析方法研究西方青年的：R·李比尔特：《激进好斗的青年一代。一个精神分析的质疑》，纽约，1971年，英文版；H·亨定：《容易冲动的年龄》，纽约，1975年，英文版。

② 《精神分析和历史》，B·马兹利锡编，新译西，1963年，英文版；《关于历史的精神分析解释》，B·沃尔曼编，纽约，1971年，英文版。

③ 弗洛伊德和布里特：《威尔逊·美国第28届总统。一次心理学研究》，波士顿，1967年，英文版。

析，而只是对具体的个性的心理学研究，然而，这部著作中使用的却是研究人的心理生活的精神分析方法。在他们看来，人的心理生活，决定着被考察的人物的国事活动 and 政治活动^①。“历史精神分析”或“精神分析历史”的现代理论家，实质上，是仿效弗洛伊德的。他们认为，历史研究的精神分析方法（这一方法是以运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观念于历史过程、历史个性为基础的），不仅有助于深刻地认识距现代人十分遥远的历史事实，而且还能够使历史本身和历史事实再现，从而使历史最大限度地接近于人^②。

精神分析思想，对于民族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13年，弗洛伊德发表了《图腾和禁忌》一书，专门揭示原始社会文化和宗教的心理，他在这本书里把精神分析作为研究民族学材料的工具来使用。弗洛伊德想借助精神分析去洞察遥远的过去的一切隐秘，他的根据就是对个别人的精神生活领域所进行的精神分析的结果同对各民族的心理、原始社会的人的心理所进行的研究结果是类似或相似的。研究民族学材料的这种方法，为把原始文化的那些过去不曾被民族学家注意的方面“显露出来”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它把许多民族学家吸引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思想上来了。^③弗洛伊德在民族学领域的继承人之一G·罗海姆，不仅在自己的民族学研究中使用了精神分析方法^④，而且在1915年他还提出要发展他称之为“精神分析人类学”这门新学科的思想。这一思想已得到其他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响应和发展，虽然仍进行着在

① 《精神分析和历史》(论文集)一书的一位作者把自己的载于此文集的文章题名为《对威尔逊的精神分析解释》(《精神分析和历史》第115—123页)，不是偶然的。

② E·埃瑞克逊：《生命的历史和历史时刻》，纽约，1975年，英文版。

③ 参见C·A·托卡列夫的《弗洛伊德学派民族学和宗教史上的起点》，载《历史和心理学》(论文集)，莫斯科，1971年，俄文版，第333页。

④ G·罗海姆：《精神分析和人类学、文化、人格和无意识》，纽约，1950年，英文版。

民族学中应用精神分析的界限和可能性的争论，但是，许多现代资产阶级研究者（如W. 明斯捷贝格、D. 弗里曼、L. 曼尼-凯勒、A·帕森斯）仍在继续研究“精神分析人类学”问题，用W·明斯捷贝格的话说，“精神分析人类学”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无意识冲动的明显性上、压抑因而冲突的存在与必然性上，以及原欲和攻击欲的发展结果上。”①

精神分析理论也没有回避自己对资产阶级法学和刑法学的影响。弗洛伊德本来没有留下运用精神分析来探讨法的问题的理论专著，但是，在他的各种著作中却包含着对罪犯心理的精神分析的解释，这种解释为法学领域许多现代资产阶级专家所赞同。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违法行为、反社会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所固有的罪恶感，而这种罪恶感是由“奥狄普斯情结”（它是对幼儿在无意识地企图排斥和取代父亲同母亲的亲密关系时的儿童时代犯罪意图的一种反应）所产生的。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特别是强烈地感受这一感情的人们，是潜在的罪犯，即所谓意识到犯罪的罪犯。对罪行所进行的精神分析的鉴定，不仅决定罪行的一定标准，而且也决定对惩罚所采取的相互措施。因此，根据这一鉴定，就可以合乎逻辑地对那些由于意识到罪恶感而犯下的罪行宣告无罪。

考察法的问题，说明犯罪原因和评价所犯的违法行为的精神分析观点，已经武装了现代许多资产阶级法学家，而且已成为判定罪行时的一种标准的实际应用，也成为判定为既定环境受害者这种罪犯无罪的一种标准的实际应用。现代，在西方世界审判过程中担任主角的，往往是遵循精神分析观点的鉴定专家——精神病理学家。这种审判实践引起了许多理论家的忧虑：他们担心，在犯罪学中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必将产生对社会不负责任和个人绝望的伦理学，到那时，负责的传统思想将会完全被那种宣告

① 《人及其文化：〈图腾和禁忌〉以后的精神分析人类学》，W. 明斯捷贝格编。伦敦，1969年，英文版，第21页。

罪行无辜的精神分析原则所代替。如果今后法律机构将继续遵循弗洛伊德的伦理学的话，那么，就会象一些专家所认为的那样，那些在某种程度上还尊重法律和遵从已确立的法律秩序的人，就有可能变成罪犯而不受惩罚，因为承认他们心理不正常，因此，现存的社会就将变成一个真正的病态社会^①。

精神分析的主题也常常用于西方的各种艺术创作体裁，其中包括“意识流”文学、荒诞派的戏剧、超现实主义、硬性戏剧作品，脱离现实的诗歌、启示录式的散文、冲动性的小说和刺耳的音乐^②。精神分析思想在资产阶级文学当中得到了十分广泛的传播，其中精神分析的题目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一些遵循弗洛伊德方针的作家们的作品，一旦把主要重点放在个体日常情境的性行为的内幕，就带有过分夸张地解释精神分析思想的性质。在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时，这些作者津津有味地描述着色情场面，向读者吐露大量最见不得人的隐私。不过，在弗洛伊德主义文学中，也能碰到一些真正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通过对人的活动的无意识的动机和人物意识深处爆发的潜藏着的悲剧的描写，来揭示个性的各种复杂的内心感受。英国女作家艾利丝·梅尔多克最近写的一部长篇小说《黑色王子》，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在这部小说中，艾利丝巧妙地把下列几方面都结合在一起：即讽刺性地模拟精神分析方法对小说主人公布赖法里·彼尔逊的生活的解释；不愿接受弗洛伊德对“奥狄普斯情结”的原始说法；走了样的，但还是接近于精神分析对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解释；弗洛伊德关于艺术天才、下意识的形象、自然表现的低级本性的思考，这些思考把蒙蒙胧胧的、支离破碎的意识在伟大的艺术或炽烈的爱情的烘炉中熔为一体了。

① R·拉彼埃：《弗洛伊德伦理学，对破坏美国性格的分析》，纽约，1959年，英文版，第179页。

② 对资产阶级艺术中弗洛伊德学派的批判分析，参见M. H. 阿法西诺夫的《弗洛伊德主义和资产阶级艺术》一书，莫斯科，1971年，俄文版。